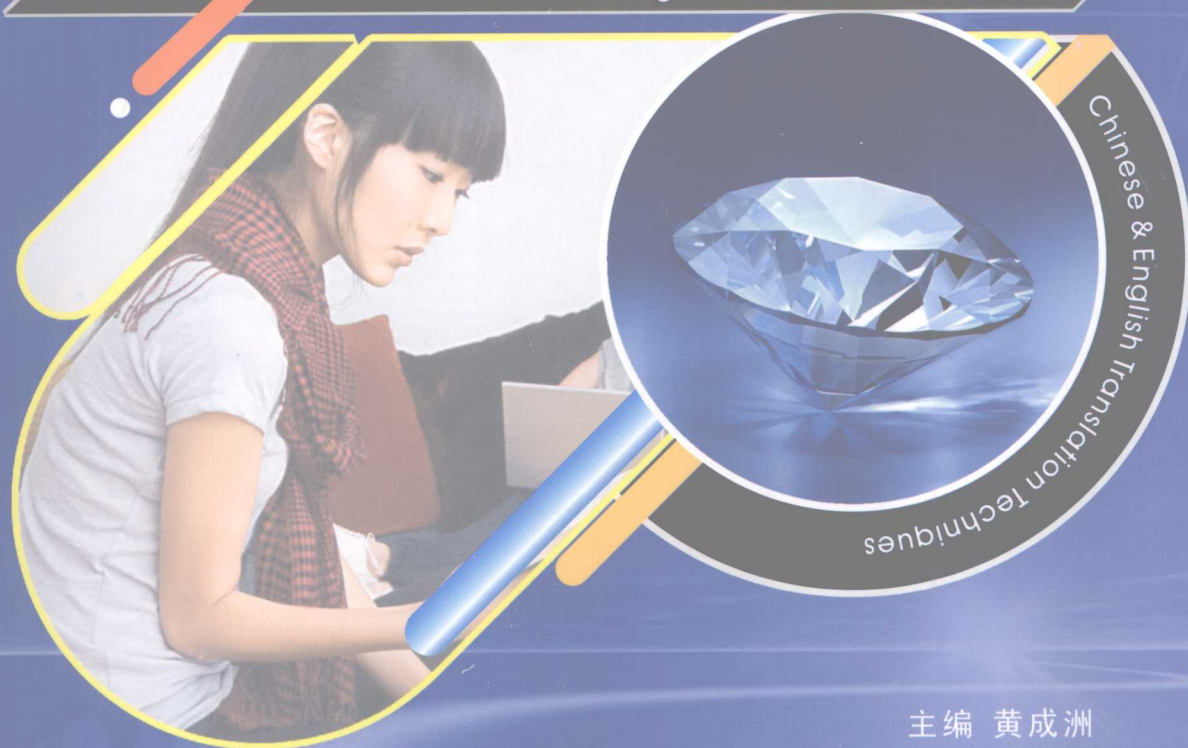


新世纪翻译技巧丛书

汉英翻译技巧

——译者的金刚钻

Chinese & English Translation Techniques



主编 黄成洲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PRESS

新世纪翻译技巧丛书

汉英翻译技巧

——译者的金刚钻

主 编	黄成洲				
编 者	黄成洲	张春芳	陈 颖	张庆芳	
	王新朋	王春燕	陆 婷	韩 燕	
	张琴芳	孙茹婷	彭倩倩	Dr. Kairui Feng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新世纪翻译技巧丛书》共分上、下两册,即《汉英翻译技巧——译者的金刚钻》和《英汉翻译技巧——译者的金刚钻》。本书共分三部分,十章。第一章介绍中国翻译史。第二章介绍翻译的标准与过程。第三章讲述汉英文化差异与翻译。第四~八章分别研究词语、句法、篇章、修辞与文体的翻译方法与技巧。第九章针对读者常见的翻译难点进行讨论与归纳。为了方便读者巩固所学知识,第十章提供了名篇翻译练习,还在附录中给出了参考答案。本书的特点可用八个字概括:新、巧、佳、活、强、精、宽和全。

本书定位在国内高校英语专业研究生、本科生的翻译教学上,同时也可作为翻译爱好者和翻译工作者的参考资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英翻译技巧/黄成洲主编.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1
(新世纪翻译技巧丛书)
ISBN 978-7-5612-2496-0

I. 汉… II. 黄… III. 英语—翻译—研究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7948号

出版发行: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通信地址:西安市友谊西路127号 邮编:710072

电 话:(029)88493844 88491757

网 址:www.nwpup.com

印 刷 者:陕西宝石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 mm×1 092 mm 1/16

印 张:18.625

字 数:503千字

版 次: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8.00元

前 言

翻译教学包括两个方面,即翻译教学和关于翻译的教学。前者的重点是翻译实践的方法和技巧;后者的重点是翻译的知识或理论。本丛书对方法与技巧,知识与理论两大方面努力做到了兼顾。全书内容特别注重使之适合课堂教学使用。

本丛书定位在国内高校英语专业研究生、本科生的翻译教学上,同时也可作为翻译爱好者和翻译工作者的参考书。

本书的教学思想以翻译实践为主,教学内容以方法、技巧为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目标是培养实用型人才。在翻译方法上力图拓展新的空间,在翻译技巧上总结新的经验,在教学方法上贯彻新的理念,尽可能适应实际需要,为学生进入社会人才市场创造条件,即为学生提供一把多功能的金刚钻。

本教材的特点可用8个字概括如下:

(1)新:介绍了西方当前最新的翻译理论。面对众多翻译书籍均回避西方翻译流派这一做法,本书在介绍当前西方各大翻译理论流派的基础上,结合译界最新动态,将西方翻译理论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语文学阶段、结构主义阶段、解构主义阶段和建构主义阶段,并依次对这四个阶段进行了概述。

(2)巧:介绍了译界最精巧的翻译方法。从词法、句法、语篇三个层面介绍了翻译行家的翻译技巧,力图在翻译方法上拓展出新的空间,在翻译技巧上总结出新的经验。

(3)佳:纳入西方名篇佳作。译例及练习多来自于西方的经典著作或名家之笔,读者既能欣赏英美作者的名篇佳作,又可领略到翻译行家的翻译方法与技巧。

(4)活:翻译方法灵活多样,体现了一个“活”字。

(5)强:着力于强化读者的翻译技能。在讲解理论的过程中,提供大量的译例,并附有译文、分析和解说,以帮助读者快速掌握翻译理论与技巧。同时,在每一章节后面均附有精心设计的练习若干,以巩固所讲内容,强化读者的翻译技能。

(6)精:理论部分讲述精练、简洁,富于概括,便于读者快速查阅,省时省力。

(7)宽:选材广泛,译例丰富,覆盖面宽。除了一般翻译书籍涵盖的内容以外,还专门设置了汉译英实用指南一章,针对读者常见的翻译难点进行讨论、归纳。

(8)全:具有内容最全面的综合训练篇章。为了进一步提升读者的翻译技巧,书末专门设置了名篇翻译练习一章,内容涵盖科技文体、法律文体、论述文体、记叙文体、说明文体、新闻文体、应用文体、艺术文体等8个方面,对读者进行全面训练。

本书的编写体例是:理论讲解在前,例句在后,而后是翻译,最后是分析。在翻译技巧的取舍上,没有局限于传统的框架。容易掌握的技巧一笔带过,甚至忽略不谈,而对不熟悉的技巧则多加总结、描述。本书在讲述中所举的例子,多属作者自己编写,也选用了前人的成果,都在

书末注明出处,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希望本书对翻译爱好者也有所帮助,对海外读者学习中文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衷心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对本书不吝提出批评指正,以便改进和提高。

黄成洲

2008年1月1日

于江苏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

目 录

第一部分 汉英翻译概论	1
第一章 中国翻译史概述	1
第二章 翻译的标准与过程	7
第一节 翻译的标准	7
第二节 翻译的过程	10
第三章 汉英文化差异与翻译	14
第二部分 汉英翻译方法与技巧	20
第四章 词语与翻译	20
第一节 增词翻译法	20
第二节 省略翻译法	26
第三节 转译翻译法	31
第四节 形合与意合翻译法	36
第五节 动态与静态翻译法	41
第六节 话题与主语	44
第七节 人称与物称	46
第八节 词语的虚实转换	48
第五章 句法与翻译	52
第一节 句子的翻译	52
第二节 “是”字句的翻译	62
第三节 “把”字句的翻译	67
第四节 强调句的翻译	71
第五节 被动句的翻译	78
第六节 长句的翻译	82
第七节 汉语无主句的翻译	88
第六章 篇章与翻译	94
第七章 修辞与翻译	98
第一节 谚语的翻译	98
第二节 歇后语的翻译	102

第三节	汉语成语的翻译	106
第四节	委婉语的翻译	112
第八章	文体与翻译	119
第一节	广告文体的翻译	119
第二节	论述文体的翻译	130
第三节	记叙文体的翻译	134
第四节	说明文体的翻译	139
第三部分	汉英翻译指导与实践	146
第九章	汉译英实用指南	146
第一节	旅游用语的翻译	146
第二节	汉语虚词的翻译	150
第三节	汉语新难词语的翻译	153
第四节	汉语倍数增加与减少的翻译	164
第五节	模糊语义的翻译	169
第六节	形象的翻译	173
第七节	标点符号的翻译	178
第八节	误译举例	182
第十章	名篇翻译练习	192
第一节	科技文体	192
第二节	法律文体	194
第三节	论述文体	195
第四节	记叙文体	197
第五节	说明文体	199
第六节	新闻文体	201
第七节	应用文体	204
第八节	艺术文体	208
附录	参考答案	215
参考文献		288

第一部分 汉英翻译概论

第一章 中国翻译史概述

中国的翻译大致经历了以下五个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译经时期

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相互交流,所以最早的翻译是口译。翻译的历史与语言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原始部落的经济和文化活动属于一种各自为政的区域性活动。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自我封闭的社会形态显然阻碍了人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各部落群体之间便产生了跨越疆域,向外发展的欲望,产生了同操不同语言的民族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需求。语言不通显然成了影响这种跨民族交流的障碍。于是构筑人类跨文化、跨民族的实际活动的桥梁——翻译,便应运而生。

夏、商、周时代就有翻译。在《册府元龟》中,有“夏后即位七年,与夷来宾”的话语。“与”等于“country”,“夷”等于“foreign”,“宾”等于“visit”,即“有外宾来访”。有外宾来访就离不开翻译。“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与,方”即我国的少数民族,不是真正的外国人。最早的书面翻译在刘向的《说苑》中有反映,其中有《越人歌》。我国翻译事业,约有 2 000 年的历史,大致是从译经开始的。西汉末年,丝绸之路已经开通,我国与西域诸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交流十分频繁,因此,翻译就成为必须。此时,佛教也通过商人和使节传入我国。我国翻译事业也随之兴起。东汉初期(公元 69 年)我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在洛阳建成,这是我国第一所译经寺院,一批重要的佛经译本由此问世。我国佛经翻译事业以隋唐最为鼎盛,此后逐渐衰落,到北宋仁宗景佑年间,佛经译场停顿。元、明、清三代虽有译经活动,但已不足为道。

在初期的译经活动中,基本是由外来僧人担任主译,但是他们不懂汉语,就由民间信徒帮助翻译,也有文人学士奉教润文。就翻译方法而言,他们只是照文翻译。翻译初期由于佛经译本缺乏,凡有译本问世,一概受到欢迎。就佛经及佛经翻译的性质而言,“宗教的经典重在传真,重在正确,而不在词藻文采”,“重在读者易解”,而不在“古雅”(胡适,1984)。此时的佛经翻译务求忠实审慎,不失本,对于通达与文采尚欠考虑。鲁迅评论说:“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质直”即“直译”。鲁迅先生恰当地概括了当时直译的要旨。

我国译经卷帙浩繁,但是能够保存下来的却不多。以下简单介绍一下号称“三大译经家”的鸠摩罗什、真谛和玄奘。

鸠摩罗什(公元 344—413 年),天竺人(印度人),也称“罗什”,后秦时代的僧人。他出生于西

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7岁随母出家,开始学佛。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后秦王姚兴派人迎他到长安(今西安),请他住进西明阁及逍遥园,待以国师之礼。此后的8年内,他与弟子一起系统地翻译介绍了龙树中观学派的著作,如《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还有《成实论》、《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中观经》等共计300余卷。这些经论后来都成为中国佛教宗派依据的重要著作。他批判地考证了以往的翻译,一改过去朴拙的古直风格,创造出一种读起来使人觉得具有外来语与汉语调和之美的文体,既充分照顾到汉语语言习惯,又力求不失梵文(印度语)原意。在提倡意译的同时,他还提倡署名经典。他所译的经论,其译文神情毕肖,妙趣横生,特别为中国佛教徒乐诵,对后来的佛教文学也有影响,同时也奠定了我国文学翻译的基础。

真谛(公元499—569年),天竺人(印度人),南北朝时代僧人。他于梁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应梁武帝邀请,来华译经传教。他与弟子共译经论纪传64部,270多卷,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大乘瑜伽行派的思想,所译《摄大乘论》影响最大,是南朝摄论学派的主要理论根据,对我国佛教思想影响很大。

玄奘(公元602—664年),俗称“唐三藏”、“唐僧”,在我国家喻户晓。他在世界翻译史上也占有很高的地位。印度学者柏乐天(P. Prodhon)说过,玄奘是有史以来翻译家的第一人,他的业绩将永远被全世界的人们铭记。玄奘继承“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传统,提出“五种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此无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术。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不翻”就是用英语直接转写,即音译。他的“五不翻”总结了音译法规律:①佛教密语须音译;②佛教中的多义词须音译;③不存在相应概念的词只能音译;④已经约定俗成的古音译应保留;⑤为避免语义失真用音译。他的“五不翻”对保留原文的意义和效果、填补文化和语言差异造成的词义空缺以及引进外来词语都具有重要意义。柏乐天认为玄奘的译文有六种方法:①补充法;②译名假借法;③省略法;④更位法;⑤分合法;⑥还原法。此外还有八大手续:①度语:思考成文(度曲=作曲);②笔受:下笔成文;③缀文;④参译(校对);⑤刊定;⑥润文;⑦梵现;⑧检阅。

玄奘深通佛学,精通梵语,汉语造诣又深,翻译出来的经论非常精确,在他主持下纠正了旧译的许多错误,后人通常称玄奘主译的经论为“新译”。玄奘从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至十九年(公元645年),历时17年,西行取经求法,从长安到古印度,往返5万里,所闻所履,有三十几国,带回大小乘经律论达657部之多。回国后在唐太宗支持下专心译经,先后译出大小乘经共75部,1335卷,其中主要有《大般若经》、《大菩萨藏经》、《解深密经》、《称赞净土经》、《瑜伽师地论》、《毗婆沙论》、《成唯识论》、《俱舍论》等,他还把《老子》及《大乘起信论》译为梵文,传入印度,这是他首次进行汉译外的尝试,他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为梵文,成为汉译外的鼻祖。在翻译理论上,他提倡“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意即“忠实”、“通顺”,该理论对后世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鸠摩罗什、真谛和玄奘一直被视为我国佛教学三大翻译家。

在佛经翻译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国其他领域翻译事业方兴未艾。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汉朝与中亚各国的友好往来,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也有少量的科技著作传译进来。隋唐年间,有《婆罗门天文经》、《宿曜经》、《都利津斯经》等科技译文传入我国。

二、第二阶段:引入西学

我国翻译事业悄然步入第二时期,是在明代万历年间至清代“新学”时期,也称“科学时期”。这期间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琴南)和严复(又陵)等为代表的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

明代万历年间到清代,佛经翻译呈现一片衰落景象。明末清初,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如英国的培根(1561—1627年)、意大利的伽利略(1564—1642年)等。大批商人及传教士经印度前来中国经商、传教。当时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空疏的唯心理学和八股文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明末王朝,既饱受倭寇之患,又遭到北方勃然兴起的满洲贵族的威胁,这就使一些有识之士从富国强兵的愿望出发,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此外,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侵略中国沿海地区,欧洲的传教士将基督教传入中国。西方耶稣会初在中国成立,传教士们欲发展势力,苦于无入门之方,遂通过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历法、算学、测量、建筑、地理等,来接近当时的士大夫,以扩大影响。这与士大夫们当时的愿望一拍即合。于是二者合作,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便开始了。可以说,从明末到戊戌维新300多年间,我国科技翻译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我国士大夫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来华教士合作翻译,到罗马教皇解散耶稣会为第一阶段(1582—1773年);新教士来华以后直到戊戌维新之间为第二阶段(1810—1898年)。

徐光启 (1562—1633年,官至礼部尚书入阁参机务) 明末科学家,他是第一个把西方近代科学思潮和方法引进我国的。他十分重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从师意大利人利玛窦学天文、算法、火器等,与其合译了6卷古希腊人欧几里得(Euclid)的《几何原本》。两人又合写了《天学实义》,介绍天文知识。他还与利玛窦合作翻译过《测量法义》一卷,我国经纬度的精确概念当始于此。可是他不懂外语,但经他勘定的术语,其中不少沿用至今。徐光启的翻译特点是:①态度严谨,译文准确,文理通顺;②翻译方法灵活得当。由于他对待科学态度严肃认真,学识渊博,所以他的翻译非常成功。明末与西方耶稣会教士共同参与科技翻译活动的,除了徐光启,著名的人士还有李之藻、李天经、王徵等。

林纾 (1852—1924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文论家、诗人和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他和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翻译了160多部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他的译作文笔流畅,但由于其本人不懂外文,因此他的译作删减、遗漏之处甚多。

严复 (1853—1922年)清代翻译界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我国翻译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严复13岁入船政学堂,23岁受派留学于英国海军学校。学成回国后钻研古文,他在中外文和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的造诣都很深。其翻译活动主要集中于光绪二十四年至宣统三年(1898—1911年),历时13年。他的译事活动除涉及科技外,还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领域,译作多属于西方政治经济学著作,如T. H.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Adam Smith的《原福》(*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the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Montesquieu的《法意》(*Spirit of Law*), H. Spencer的《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 J. S. Mill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穆勒名学》(*System of Logic*), E. Jenks的《社会通论》(*History of Politics*)等。

严复的贡献不仅在其翻译实践,更重要的是他根据我国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这一标准对后人的翻译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百余年来一直是译界普遍遵循或争论的焦点。

这一时期的著名翻译家还有梁启超、徐寿、华蘅芳等人,他们对组织翻译活动、传播社会科学和科技知识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引进西学,主要侧重于自然科学,但宏观地看,它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更多的却在社会价值。

科学知识对人类社会思潮本来就具有渗透作用,当时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没能促使中国科学技术同步发展,却与引进的新思潮以及当时社会改革的呼声共鸣。

三、第三阶段:传播新潮

“五四”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至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翻译事业的第三个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是我国翻译史上的重要时期,其翻译活动的规模和影响超过近代任何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题材开始涉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译语用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拓宽了译文的接受范围。

1915年《新青年》杂志一创刊,就开始译介西方文化思潮和文学作品,揭开了中国现代翻译史的序幕。《新青年》的翻译活动与当时的启蒙运动是相配合的。《新青年》高举批判封建旧文化、发展中国新文化的旗帜,提倡民主与科学。屠格涅夫、王尔德、莫泊桑、易卜生、泰戈尔、安徒生、武者小路实笃等作家的作品相继在《新青年》上译载。当时新青年社的成员,既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成员,又是外国文化思潮的翻译者和介绍者。如那时的鲁迅、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他们都十分重视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化思潮,积极从事这方面的活动。所以,我国现代翻译一开始就与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1917年“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后,马克思主义随即传到中国。

1920年,陈独秀、陈望道在上海组织起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从日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也在当年问世;上海岫庐书社还出版了郑次川翻译的《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1921年成立了人民出版社,由李达负责编辑《马克思全书》,原计划出版15种,后来只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及《资本论入门》等3种。此外,在当时的《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也不断有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发表。这些译著对于中国革命者和中国人民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此后,重要的马列著作继续翻译出版。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180多万字的《资本论》(三卷)于1938年第一次在上海出版。张仲实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他还翻译出版了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毛泽东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曾大段引用该译文)以及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等书。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生活书店先后以《世界名著译丛》(1938—1947年,14种)、《世界学术名著译丛》(1947—1948年,11种)的名义集中出版了经典作家的主要著作的中译本。

在解放区延安,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组织翻译了《列宁选集》20卷。这样,马列主义进一步在中国得到了传播。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党成立了直属南方局领导的对外宣传小组,由周恩来领导,王炳南具体负责,任务是向国外翻译介绍毛泽东著作、八路军战报以及抗日文章,译者有许孟雄等人。他们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几十篇著作译成英文,此外也翻译有关抗战的通讯报道,这在国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鲁迅是中国现代翻译史上杰出的翻译家和披荆斩棘的开拓者。据统计,在他的一生中创作与翻译各半。鲁迅译作的特点是思想性强、涉及面广、体裁多样。鲁迅一生翻译介绍了大量作家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他翻译介绍了俄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奥地利、芬兰、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日本等13个国家近百位作家的200多种作品。其中有文艺论集5本、文艺政策1本、美术史专集1本、文艺随笔1本、杂文集1本、童话集5本、长篇小说2部、短篇小说64篇、科学小说3种、中篇小说2篇、剧本2个、童话剧1本、诗歌10篇、杂文20篇。鲁迅的文学生涯可说是从翻译始,又以翻译终。对于翻译事业,他表现了始终一贯的高度革命责任感和明确的目的性。提倡翻译要“兼顾两面,一当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这与今天翻译界普遍认

可的“忠实、通顺”实质上是一致的。总体上讲,鲁迅倾向于直译,特别是针对当时“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以及“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主张,他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原则。这对纠正当时不负责任、信手乱译的现象具有积极的作用。

翻译界和鲁迅同时期的杰出代表还有瞿秋白。瞿秋白曾译过俄国和苏联的优秀作品《毁灭》、《死魂灵》。

四、第四阶段:稳步发展

1949—1976年是我国翻译事业的第四个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虽在“文革”期间遭到了摧残,但成绩依然很大。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翻译事业也得到了解放。从那时起,翻译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断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日益充实完善。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1)翻译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工作,逐渐取代了抢译、乱译和重复劳动及浪费的现象。

(2)翻译作品质量大大提高,译风日见端正,逐渐克服了粗枝大叶、不负责任的风气。

(3)翻译工作者不仅肩负着外译汉的任务,同时为了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介绍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以及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还肩负了汉译外的任务,使翻译由外译汉单向性翻译变成汉外兼顾的双向型翻译。

(4)对翻译标准的认识日趋统一,翻译标准也日趋统一,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的翻译事业。

(5)翻译研究方面基本围绕直译和意译等传统性问题,没有突破“信、达、雅”的约束,更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翻译理论体系。

建国以来,我国翻译事业的成就超过了任何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文化交流的需求推动了翻译事业的发展,翻译事业向纵深发展又促进了文化交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翻译的内容涉及政治理论、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商业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翻译的语种大大增加,翻译的方式不拘一格,翻译理论的建树百花齐放,汉外互译,译作数量之丰、质量之高都令人振奋。国家成立了翻译局和专门的译文出版社,创办了翻译杂志,丰富多采的翻译实践更是造就了一大批素质良好的专业翻译工作者,他们还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中国译协)及其在许多省市的分会,中国译协还加入了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国际译联),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翻译工作者的联系和交流。在高等学校教学计划和大纲中,“翻译”被列为外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要求讲授翻译基础理论与常用技巧,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举措对培养合格的翻译人才意义重大,有助于翻译事业的持续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号召全国人民为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而努力奋斗。我国广大翻译工作者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通过辛勤的翻译劳动,介绍和交流先进科技知识、优秀文艺作品以及民族文化,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和世界和平不断作出贡献。

五、第五阶段:阔步腾飞

1976年至今,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翻译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重返联合国,自此我国的国际地位快速提升。进入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80年代后,我国的经济开始腾飞,对外开放的国门也因而越开越大。在东西方许多国家和地区

经济陷于衰退的 90 年代,我国的经济列车仍以其强劲的活力,沿着通向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之列的轨道继续高速行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已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成了许多海外投资者和观光客的首选目标。以稳健的步伐走强国之路的全面开放的中国,对外交流的接触点越来越多,接触面越来越广,各类翻译人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高级译员的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

今天,历史的车轮已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纪。这是全面振兴的世纪,重铸辉煌的世纪,是中华文化同世界文化广泛交流、共同繁荣的世纪,也是翻译事业的黄金时代。这些年来,我国同世界各国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使我们能更好地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我们。涉外翻译工作者作为中外交往的一支不可或缺的中介力量,肩负着历史的重任。今日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大批合格的专职或兼职翻译人员来共同构筑和加固对外交往的桥梁,今日的翻译界比以往任何时期更需要对翻译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全国各高校的本科专业纷纷开设翻译课程,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它已被越来越多的高校列入英语硕士研究生班的教学大纲。这是时代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市场的需要。翻译规模和质量进一步提高,题材进一步扩大,形式更加多样。口译(含同声传译)已和笔译并驾齐驱。理论方面,也开始探讨建立我国独特的翻译体系。现代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步渗透到翻译领域。特别是近 10 年来翻译理论研究的成果更令人瞩目,在继承传统译论和吸收外来翻译思想的基础上,翻译家们对译论的研究扩展到各种不同的文体,深入到翻译的原理、标准、地位、层次、方法、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翻译史和翻译理论史等诸多方面。

六、小结

约两千年的翻译历史为我们积累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前人的翻译经验,批判地吸收前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方法,以便继续提高我们的翻译水平,发展我国的翻译事业。

练 习

1. 我国的翻译史大概可以分为哪几个发展阶段?
2. 我国“三大译经家”是谁?玄奘的“五不翻”指的是什么?
3. P. Prodhan 认为玄奘的译文有几种方法,几大手续?

第二章 翻译的标准与过程

第一节 翻译的标准

傅雷认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以甲国文字传达乙国文字所包含的那些特点，必须像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而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

说起翻译标准，有些人，甚至是翻译圈子内的某些人，可能会不以为然。有的说：要什么翻译标准。即便有了，又能怎么样？错误百出、粗制滥造的译作还不是照样纷纷出笼？有的则感到奇怪：翻译标准不是早就有了：严复的“信、达、雅”，还要研究、探讨什么？还有的则感叹：对翻译标准的认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本无法统一。何必白费力气！还是顺其自然吧！

针对上述有关翻译标准问题的几种看法，本节着重谈谈以下几个问题。

一、翻译标准的作用

世界上哪一样工作离得了“标准”？在如今现代化的社会，三百六十行中，各行的产品、成果都有检验质量的“标准”。任何一个人的衣食住行，都与“标准”紧密相连。正因为“标准”无处不在，无人不晓，持有“翻译标准无用论”的人，恐怕主要是因为对翻译标准的重要性和作用知之甚少。

举其要者，翻译标准是：

- (1) 镜子——翻译标准是反映人们对翻译本质及翻译工作认识的一面镜子。
- (2) 监督——虽然翻译标准不可能由国家某个部门制定，但翻译标准应该而且可以像工业产品标准那样成为制约翻译工作，衡量译作优劣的准则。
- (3) 依据——翻译标准是评论译作的依据，贬劣品，扬杰作，促使优秀的译作问世，促进翻译事业健康地发展。
- (4) 促进——翻译标准给学译者、初译者指出了进行翻译工作、提高翻译水平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
- (5) 良药——翻译标准也是预防两种翻译“常见病”的“良药”：死译和滥译。所谓死译，就是像“译电报”一样的机械翻译：翻翻词典，查查释义，对号入座，全不顾读者的感受和译文的效果。何谓滥译？其一是凭借点滴原意，大肆发挥，随意增词，形同创作；其二是对原文不求甚解，避难就易，滥施删减，笔下“走私”。
- (6) 基础——翻译标准是进行翻译理论研究的根本基础。翻译学分为基础翻译学、应用翻译学和理论翻译学三大部分。基础翻译学是整个翻译学的基础，而翻译标准问题的研究又是基础翻译学的基础。对翻译标准的研究将推动、深化翻译理论研究。

二、翻译标准的历史

我国翻译界，在翻译标准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可以说，我国的翻译

标准史是一部翻译标准争论史。

1. 第一种提法：“信、达、雅”

众所周知，这是我国早期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严复的翻译标准观。究其初衷，严氏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感叹“译事三难：信、达、雅。”后来，他才将此作为翻译标准：“三者乃文章正规，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近百年来，我国译界多数人信奉、赞同严氏的三字标准，因其提法简明扼要，又有一定的科学性、权威性。但是，应该看到，严氏之后我国译界的几场有关翻译标准的论争均围绕“信、达、雅”而展开，矛盾、分歧皆出自于对这三个字的理解和解释。因此，严氏的“信、达、雅”标准有其局限性、落后性、模糊性。一方面，我们有必要对其做深入研究，继承发扬科学的内容，摒弃剔除不科学的、甚至错误的成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取得共识：“信、达、雅”可能不再是我们现在需要的翻译标准。

2. 第二种提法：“忠、顺、美”

1932年，业绩卓著的大翻译家林语堂在其著名的《论翻译》一文中给翻译定了“忠实、通顺、美”三个标准。林氏自己承认，这三个标准与“信、达、雅”大体相符。但他对翻译的认识比严复深了一层：“谈翻译的人首先要觉悟的事件，就是翻译是一种艺术。”

林氏的翻译标准虽未超出“信、达、雅”的框框，但发展、提高了“雅”的标准，加入了美学、心理学和艺术学的内容。这给后人研究、发展翻译标准，打破严复的“信、达、雅”体系以莫大启发，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当然，“美”这个字笼统、抽象，而且又到处“泛滥”，不宜立为一个翻译标准。

3. 第三种提法：“宁错务顺”

这是以梁实秋、赵景深等人为代表的见解。梁氏的说法是：“一部书断断不会完全曲解……部分的曲解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赵氏又做了概括：“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

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我国翻译史上的首场大规模的翻译标准大论争，影响极其深远。当然，“宁错务顺”断断是错误的，不可作为翻译标准。但是，对此我们不能忽视两点：其一，梁、赵只是在“信”、“顺”发生矛盾的时候，才执行“宁错务顺”标准的，把侧重点放在读者一边，所以在当今我国译界，垂青者、效法者还是大有人在。

4. 第四种提法：“宁信不顺”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学先驱鲁迅针对“宁错务顺”提出的见解，是矫枉必须过正的产物。后来，他又提出了“既力求易解，又保存原作风姿”的翻译标准观。

以鲁迅、瞿秋白等人为一方，以梁实秋、赵景深、胡适等人为另一方的翻译标准大论战，不论“宁错务顺”还是“宁信不顺”都是片面的、过激的，错在把“信”与“顺”对立了起来，而这两者对翻译而言是辩证的、不可分割的、统一的要求，缺一翻译就不能存在。“宁错务顺”主张在“信”、“顺”矛盾时，求“顺”弃“信”；“宁信不顺”则反之。

5. 第五种提法：“信顺统一”

这是瞿秋白的翻译标准观。他认为：“信”和“顺”不应当对立起来，不应当说：要“顺”就不能“信”，要“信”就不能“顺”。

“信顺统一”是我国译界第一次正面地、比较辩证而全面地提出的翻译标准观。但是，由于瞿秋白没有详细、深入地进行阐述，以及在翻译实践中没有做好“顺”，片面强调白话，未能正确处理“信顺统一”的有关问题，所以他的这个翻译标准观影响很小。

6. 第六种提法：“形似神似”

这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的翻译标准观。他在1957年发表《高老头》译本的“重译本序”时提出了这一见解。

傅雷提出：“……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这种提法还是有漏洞和欠妥之处的。如果没有“形似”，何来“神似”呢？只有先求“形似”，才能达到“神似”。“形似”是“神似”的基础。“形似神似”观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翻译的高境界、高要求，达到了有关“精神”、“气质”、“风格”的更完美的高度。它的不足之处是：忽视了基础，忽视了过渡，忽视了外在。

7. 第七种提法：“入化境界”

多才多艺的钱钟书对翻译的认识及对翻译标准的见解也独树一帜：“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钟书，1979）。“入化境界”与“形似神似”真是异曲同工。前者侧重于对译者的要求，比较口语化；后者是从读者、评论者角度提出的翻译要求，比较抽象、文气。

三、翻译的基本标准和最高标准

从释道安的“案本”（按照原文的本意），到严复的“信、达、雅”，再到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都离不开忠实这个总原则。

翻译的根本问题有两个：忠实与通顺。

1. 翻译的根本任务：忠实

鲁迅：保存着原作的风姿。

茅盾：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

钱钟书：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

首先要忠实原作的思想内容。即译者应把原作所叙述的事实、说明的事理、描写的景物、反映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完整而准确地传达出来。

其次要保持原作的风格。包括原作的民族风格、时代风格、语体风格以及作者的个人风格。译者对原作的风格不能任意破坏和改变，不能用自己的风格代替原作的风格。

2. 要解决的主要矛盾：通顺

鲁迅：力求其易解。

茅盾：纯粹的祖国语言。

钱钟书：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通顺是指译文的语言必须通顺易懂，合乎规范。即译文应该使用明白晓畅的现代语言，不可逐词逐字地硬译，否则译文便如同老舍所说的“既像汉文，又像洋文，既像语言，又像念咒。”傅雷也曾说过：“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

3. 忠实与通顺的关系

在翻译中，忠实与通顺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割裂。忠实而不通顺，读者看不懂，或看不下去，忠实便失去意义，实际上就是不忠实；通顺而不忠实，读者虽然可以看下去，但是得到的是被扭曲的信息，其危害比忠实而不通顺还要严重。因此，忠实与通顺两者一定要兼顾，忠实不妨碍通顺，通顺不影响忠实。

4. 翻译的最高标准

忠实而通顺是翻译的基本标准。在此基础上，还能充分传达出原作的神韵，则可视为翻译的最高标准。

四、小结

综上所述，翻译标准不仅对翻译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和约束作用，而且对翻译理论研究具有

不可低估的意义,甚至还关系到培养高素质的翻译人才的大事。所以,我们不仅需要翻译标准,而且有必要花大力气研究探讨翻译标准,制定科学、全面、普遍适用的翻译标准,并不断加以修改和完善。

练 习

1. 翻译标准的作用是什么?
2. 什么是翻译的基本标准?
3. 什么是翻译的最高标准?

第二节 翻译的过程

翻译是一项艰苦复杂的语言活动,其科学和艺术双重性决定了翻译过程是错综复杂的。一般来讲,可将翻译过程概括为:理解、表达和校核三个步骤。

一、理解

理解是翻译过程的第一步,是表达的前提,不能准确地理解原文就无法谈及表达问题。理解首先要从原文的语言现象入手,还要涉及语言的文化背景、逻辑关系和具体语境。

(一) 理解语言现象

语言现象的理解主要涉及词汇意义、句法结构、修辞手法和惯用法。

【例 1】 货假情真

在太太的生日宴会上,丈夫当众把一颗亮闪闪的宝石赠给他的夫人。一位朋友对他说:“瞧你夫人多高兴啊!如果你送她一辆奔驰汽车,不是更实惠吗?”

“我也曾这么想过。”这位丈夫摊开手悄声说:“可惜这种轿车目前还没有假的。”

【译文】 Genuine Feelings behind a False Gift-gem

At her birthday party, the husband, in the presence of all his guests, presented a glittering gem stone to his wife. One of his friends suggested, “How delighted your wife is! Don’t you think a Benz’d be more practical?”

“I thought about that too,” the devoted husband said, with a shrug of his shoulders. “Unfortunately, a fake Limousine of this brand is not yet available.”

(居祖纯,2002)

【分析】“货假情真”中的“货”实际上指的是“礼物”,所以应译为 gift 或 present。“生日宴会”,译为 birthday party 更符合英国人的说法,不必译为 birthday banquet。“摊开手”译为 with a shrug of his shoulders。shrug 本身并无摊开手的意思,只是耸肩,但耸肩时常会摊开手。通过此例,不难看出理解的重要性。只有理解了原文的含义,才能更好地进行翻译。

(二) 弄清文化背景、逻辑关系和语境

欧美人的文化背景和我们中国人不同,由此产生了与其民族文化有关的习惯表达法。切记不要望文生义。

【例 2】 走而不战

单位里有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领导要求希望得到这一工作的人马上提出申请,友人特